

齐涛 主编

资政通鉴

中国历代外交问题

王玮 主编



泰山出版社

齐涛 主编

资政通鉴

中国历代外交问题

王玮 主编

泰山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中国历代外交问题/王玮主编. —济南: 泰山出版社,
2009. 4

(资政通鉴)

ISBN 978 - 7 - 80634 - 729 - 4

I. 中... II. 王... III. 外交史—研究—中国
IV. D82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9) 第 024790 号

主 编 王 玮

责任编辑 于景明

装帧设计 蔡立国 路渊源

资政通鉴

中国历代外交问题

出 版 泰山出版社

社 址 济南市马鞍山路 58 号 邮编 250002

电 话 总编室 (0531) 82023466

发行部 (0531) 82025510 82020455

网 址 www.tscbs.com

电子信箱 tscbs@sohu.com

发 行 新华书店经销

印 刷 山东新华印刷厂临沂厂

规 格 165 × 240mm

印 张 30.75

字 数 280 千

版 次 2009 年 4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9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 - 7 - 80634 - 729 - 4

定 价 40.00 元

著作权所有·请勿擅自用本书制作各类出版物·违者必究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泰山出版社发行部调换

目 录

绪 论	齐 涛	/1
(一)	中国传统外交的基点	/3
(二)	中国传统外交的基本模式	/14
(三)	中国传统外交的姿态与外交地理方向	/24
一	东方型的外交观：“大国意识”与“世界意识”的错位	/32
(一)	中心与边缘、华夏与夷狄、中国与天下：中国传统外交观的思想基础	/32
(二)	天朝大国意识：游离于想象与现实之间	/43
(三)	“大国意识”到“世界意识”的嬗变：中国外交观的现代化进程	/57
(四)	“大国意识”与“世界意识”能够统一吗？	/78
二	世界三大外交体系的互动与东亚封贡体系的优劣	/82
(一)	世界三大外交体系的内涵与形成	/82
(二)	从典型事件来看世界三大外交体系在中国的互动	/96

(三)封贡体系评价	/113
三 陆通还是海通:丝绸之路的辉煌和困境	/127
(一)“凿空而通之”——张骞与西域的开通	/128
(二)丝绸之路千年历史概观:两条丝路、两种命运	/132
(三)古曲新谱——丝绸之路的现代启迪	/143
(四)万国来朝——郑和下西洋及其影响	/151
(五)“天朝上国”美梦的破灭——明清海禁 政策的失误	/165
四 文化交流中“人来取之,人来予之”的单向性	/177
(一)先秦秦汉时期——初具规模	/178
(二)魏晋南北朝以及隋唐五代时期——辐射周边	/183
(三)宋元时期——海陆全盛	/198
(四)明代以及清初年——盛极而衰	/206
五 “师夷长技以制夷”的功利性取向	/215
(一)“师夷长技以制夷”思想的产生及其发展	/215
(二)“中体西用”的洋务运动对“师夷长技以制夷” 的实践	/228
(三)甲午战争与“师夷长技以制夷”战略的失败	/235
六 在真实与虚幻之间:对传统外交体制的历史考察	/246
(一)服事制与先秦朝贡制度的起源	/246
(二)朝贡制度的理论渊源	/256
(三)朝贡制度的内涵及其运作	/261

(四)朝贡制度的时代特征	/274
七 外交礼仪之争与中国外交近代化的艰难起步	/284
(一)清前期中俄、中英外交礼仪冲突	/285
(二)新旧两种不平等制度的碰撞	/303
(三)觐礼之争与1873年的西礼觐见	/310
八 历代外交精英的地位和作用	/323
(一)先秦外交精英与早期外交理论的萌芽 及其实践	/324
(二)封建时代外交精英的地位和作用	/333
(三)晚清外交家的抗争与无奈	/345
(四)民国时期的专职外交人才	/357
九 西学东渐与儒学西传	/370
(一)传教士东来和“西学”在中国的传播	/370
(二)上帝福音的使者:利玛窦、汤若望	/379
(三)中国传播“西学”三柱石:徐光启、李之藻、 杨廷筠	/391
(四)儒学西传:十七至十八世纪欧洲的“中国热”	/401
(五)华夷之辩:东西方文化的冲突	/412
十 中国近代外交个案分析	/425
(一)观念歧异与礼仪冲突——马戛尔尼访华透视	/425
(二)曾被误解的外交主张——徐继畲与神光寺事件 评析	/433

(三)强权外交——“马嘉里案”与《烟台条约》 /441

(四)在理与势之间——曾纪泽与《中俄伊犁条约》 /450

(五)屈辱与抗争——巴黎和会关于“山东问题”的前前后后 /461

(六)南京国民政府初期“改订新约”运动评析 /470

参考文献 /478

后记 /482

绪 论

齐 涛

有关中国王朝与外部世界的各种联系与往来，史学界多归之为中外关系史，较少以作为政治实体的官方外交为出发点，分析探讨中国王朝的对外政策。我们在本书中，即试图从外交史和国际关系史的角度，解析中国传统外交政策之得失。但开篇伊始，便遇到基本概念与范畴的缺失。就外交而言，这是自近代欧洲国家形成之后才出现的概念，它是以主权国家为主体，通过正式代表主权国家的机构和人员而实施的官方行为。从国际政治与国际关系史的角度看，主权国家产生于十七世纪中叶，如刘德斌在《国际关系史·导言》中所说：“1648年威斯特伐利亚体系的出现标志着现代国际关系的缘起。这一年，结束欧洲‘三十年战争’的《威斯特伐利亚和约》的签订，破除了罗马教皇神权下的‘世界主权’，瓦解了神圣罗马帝国的势力，德意志各诸侯邦获得了主权和独立，欧洲政治开始出现一种新的格局，主权国家从此成为人类社会的一种组织形式。”基于此，他对古代国家间的关系这样表述：“古代国家间关系与现代国家间关系有很大的不同。

实际上,古代国家的概念与现代、国家的概念都不一样。古代国家有许多不是在现代意义上的民族范围内建立起来的,其主权属性有别于现代国家,甚至不具有主权属性。由于当时交通与通讯条件的限制,各国在经济上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古代国与国之间的交往往往表现为偶然性、单一性、非有机性和区域性。由领土兼并、财富掠夺和王朝征服引起的战争是古代国家间关系的主要内容。而现代国家间关系则是主权国家之间的关系,并且以经济关系为国家间关系的基础。同古代国家间关系相比,现代国家之间的交往更多地表现为必然性、多样性、有机性和世界性。”^①

上述论述对于研究中国传统外交政策不无启发意义,但其立论是以欧洲国家以及国家间关系为基点,不尽合乎中国传统的国情。就主权国家的出现而言,欧洲乃至世界大多数地区,都是在十七世纪或更晚开始出现,但不能就此论定《威斯特伐利亚和约》的签订,使“主权国家从此成为人类社会的一种组织形式。”众所周知,主权国家的基本要素是统一的政府、统一的法律、统一的民族利益和统一的关税,它是建立在强大政权统治基础上的,以统一的民族为主体的具有领土和行政主权的国家形态。以此度之,在罗马教皇神权笼罩下的欧洲各政权当然不是主权国家,但自秦王朝以来的中国各王朝却具备了主权国家的基本要

^① 刘德斌主编:《国际关系史》,高等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第2~3页。

素，是以统一的民族为主体的具有领土和行政主权的国家形态，而且，还有着代表王朝的对外官方行为，这种外交行为自秦至清一直未曾间断，其内容特色与同期欧洲国家间的交往内容存在较大不同，而且，对中国近现代的外交思维与外交政策也产生着不容忽视的影响。基于此，我们认为，中国传统外交政策应当自秦汉以来为区界，甚至应当放到更长时段与更宽视野中去考察，探寻中国传统外交政策之得失。

（一）中国传统外交的基点

外交是一个国家意志的集中体现，一个国家的外交思维、外交模式与外交取向，与其文明形态、政治传统、经济结构以及文化背景密切相关，可以说，不同国家的外交是在各自不同的传统与现实的结合点的基础之上而建立的。中国自文明产生起，就走着一条不同于西方世界的道路，也面临着与西方社会不同的自然环境与外部环境，因此，把握中国传统外交政策，也必须立足于中国的传统基点。

中国古代的文明形态是较为典型的单元文明，从地理环境看，西部的天山、阿尔泰山至青藏高原，将欧亚大陆天然地一分为二，虽然有高纬草原带可以贯通东西，但西方文明的中心始终在南方的地中海与波斯湾一带，与远处东隅的中国文明仍旧遥不可及。数千年间，只是通过草原之路以及西北丝绸之路、西南丝

绸之路、海上丝绸之路，保存着断断续续的人员与经济往来。至明清为止，中国王朝与西部世界正式的官方关系一直十分薄弱，甚至可以说尚未有正式的外交往来，文明体之间的直面交流与碰撞也很少出现。中国王朝所面对的主要是北方与西北方的草原民族、东方的朝鲜半岛与日本列岛以及东南亚诸国，相对于这几个方位的民族与政权而言，中国王朝的强大与文明之发达是他们所不能企及的。东部的朝鲜半岛与日本列国，不论其列国并存还是统一时代，中国文化与政治的影响都几乎是唯一的，东南亚诸国在西方殖民势力进入之前，也是以接受中国王朝的影响为主，辅之以印度文化与政治的影响。北方与西北的草原民族及其建立的政权是时而可以与中国王朝相抗衡的力量，这一力量与中国王朝的关系有三，一是双方并存，战与和交错不定，以和平与安全为主，双方有较为频繁的经济与政治往来；二是北方草原力量大举南下，建立中国王朝式的统治或取而代之，如北魏、辽、金、元以及清王朝都是如此；三是中国王朝强力反击，草原力量或退至漠北或西迁至中亚、西亚以至更远。需要指出的是，上述关系虽然与欧洲蛮族同罗马帝国等文明体的关系有些类似，但区别仍十分明显。最大的区别就是，不论北方草原力量是撞击还是取代中国王朝，其结果都是造就了中国文明更强有力的延续，都走着融合与同化之路，中国文明一直未因此而间断。

这种传统造就了中国文明的单元性，使其自成一体，以自我

为中心，居高临下地向周边进行着辐射式外交。我们可以比较一下西部世界的文明状况。早期西方文明主要集中在地中海地区与波斯湾地区，中世纪时代，延及欧洲大陆与西亚、中亚腹地。这些地区最大的特点就是密不可分，由于同属一个大的地理空间，不同民族，不同政权以及不同文明体之间始终存在着冲突与交融。而且，无论哪一区域，都未能出现像中国文明这样的持久不断的政治中心与文明中心。尽管时而有跨地域的帝国出现，但国家政权间、不同的民族之间，对等的冲突与竞争是一以贯之的主线。

早在古埃及文明时代，第十九王朝与赫梯人对叙利亚地区的争夺便旷日持久，拉美西斯二世与赫梯人的卡叠什大战持续了十六年之久，最后于公元前 1283 年签订了《赫梯国王哈吐尔和埃及法老拉美西斯二世的和平条约》，这是传世最早的一部国际条约。再如，中世纪时代的英法百年战争也很典型，英法本为联姻之国，法王腓力四世之女即远嫁英王。1328 年，腓力四世之子，法王查理四世死后无嗣，腓力四世之外孙、英王爱德华三世要求继承法王之位，以此为导火线，英法两国为争夺大陆上的领土爆发了百年战争，战争中先后签署过《布勒丁尼和约》和《特鲁瓦条约》，最后以英国的失败而告终，英国的失败只是退回英伦三岛，它仍是一个可以与法国比肩的封建王国。

中国古代王朝与邻国却未曾发生过类似的关系，隋炀帝时

代，日本国王一度要与隋王朝建立对等关系，以日出处天子的名义致书日落处天子，但并未改变以中国为中心的辐射式外交的格局。

中国古代也存在类似于英法间的政治联姻，亦即和亲。如昭君出塞、文成公主远嫁吐蕃等等，但除了春秋战国时代列国的联姻尚较为对等外，汉唐时代的和亲往往以羁縻为目的。唐高祖就主张对于周边势力，“当用长策以驭之，和亲而使之，令其畏威怀德。”^①即便是迫于对方的强势而和亲，仍然要摆出居高临下的架势。在中国王朝看来，和亲的意义是通过血缘连接，结甥舅之好，中国古代舅权地位之尊崇恰可以满足王朝当政者的虚荣心。如，对于唐蕃和亲，吕温即咏道：“明时无外户，胜境即中华。况今舅甥国，谁道隔流沙。”^②对此，吐蕃也表示认同，开元年间，曾上表称：“外甥是先皇帝舅宿亲，又蒙降金城公主，遂和同为一家。”^③

就政治结构而言，中西之差异也十分明显，中国自文明形成至明清时代，传统政治先后经历了共主制、宗主制、集权制三个历史阶段。国家产生之初的夏王朝为共主制，所谓共主制相当于近世松散的政治联合体。在中国早期国家形成过程中，首先出现的是以宗法血缘关系为纽带而组成的小型宗族国家——方国。中

① [唐] 温大雅：《大唐创业起居注》。

② 《全唐诗》卷三七〇，吕温：《吐蕃别馆和周十一郎中杨七录事望白水山作》。

③ 《旧唐书·吐蕃上》。

原的尧舜禹集团与其东方盟友伯益集团最初都是这样的“方国”，两者的联合形成了一个较大地域范围的政治与权力中心，在此基础上，通过战争、婚姻和其他方式联合起了大批方国，所谓“禹合诸侯于涂山，执玉帛者万国”，^①讲的就是这样一情况。这些大大小小的方国只有少数与王族有血缘上、政治上的紧密联系，多数方国只是名义上的属邦，共同拥戴夏王而已。而且，最初的夏王确实也是“拥戴”产生，这也就是所谓的“禅让”制。舜之代尧，禹之承舜，都是由此而立。禹对于自己的继任者，先是“举皋陶而荐之，且授政焉，而皋陶率”，“而后举益，任之政”。^②虽然最后还是其子启承袭了禹的权力，但仍有方国拥戴的痕迹，“诸侯皆去益而朝启”。

商周王朝为宗主制，所谓宗主制，是建立在宗法制与分封制基础之上的政治分享体制。以西周王朝为例，周灭商后，将子弟姻亲与功臣，派往各地建邦立国，亦即“封建亲戚，以藩屏周”，分封以王族子弟为主，周初“立七十一国，姬姓独居五十三人。”^③周王及其继承人为天下之大宗，即宗主，其他封国均为小宗。分封之后，周王朝形成以周天子及其属地为核心的若干层级的统治体系，也就是所谓的五服之制。《国语·周语上》云：

① 《左传·哀公七年》。

② 《史记·夏本纪》。

③ 《左传·僖公二十四年》。

先王之制，邦内甸服，邦外侯服，侯卫宾服，蛮夷要服，戎狄荒服。甸服者祭，侯服者祀，宾服者享，要服者贡，荒服者王。日祭，月祀，时享，岁贡，终王，先王之训也。有不祭则修意，有不祀则修言，有不享则修文，有不贡则修名，有不王则修德，序成而有不至则修刑。于是乎有刑不祭，伐不祀，征不享，让不贡，告不王。于是乎有刑罚之辟，有攻伐之兵，有征讨之备，有威让之令，有文告之辞。布令陈辞而又不至，则增修于德而无勤民于远。是以近无不听，远不服。

所谓甸服、侯服、宾服、要服与荒服，实际上是周王朝政治统治的三个层级。第一层级亦即核心层，指周天子的直属领地邦畿；第二层包括侯服与宾服依与周天子的亲疏以及远近而定，为藩属层，属于周王朝的有效统治范围，如韦昭注云：“邦外，邦畿之外也，方五百里之地，谓之侯服。侯服，侯圻也。”“言自侯圻至卫圻，其间凡五圻，圻五百里，五五二千五百里，中国之界也。谓之宾服，常以服贡宾见于王也。”^①第三层级为要服与荒服，为周王朝的势力范围所至，即更远一层的蛮夷与戎狄，他们只是拥周天子为共主，每岁一贡或在位时朝觐一次即可。因此，韦昭对“要服”的解释是：“要结好信而服从也”；对“荒服”的解释是“荒忽无常之言也”。

^① 《荀子·儒效》。

值得一提的是，在对不同层次的关系处理上，也有明显区别，对于第一、二层次内的“不祭”、“不祀”、“不享”，可以刑之、伐之、征之；对于第三层次的“不贡”与“不王”，则只是“有威让之令，有文告之辞”。仍不奏效，也不用兵刑，而是“增修于德而无勤民以远”。这是典型的内外有别。

自秦汉以来各王朝的国家形态均为集权制。所谓集权制，就是中央王朝通过中央机构以及在全国范围内以地域为原则层层设立的地方机构，实现对境内政治、军事、经济、文化事务以及全体国民的集中统一的管理。而欧洲国家之成为统一集权的民族国家，则是伴随着资本主义的出现而实现的。当然，中国王朝的周边国家也未能像中国这样走上集权与统一之路。在这样一种与外界存在明显差异的国际环境中，中国王朝的外交政策自然也会深深地打上自己独有的政治烙印。

就经济结构而言，中国传统经济结构体现为“地大物博”与“自给自足”两大特色，“地大物博”之说早已深入人心，尽管在当代社会，人与环境的矛盾十分突出，对这一特性正在重新认识，但就古代社会而言，秦汉以来的各王朝疆域内，的确是地大物博，应有尽有。早在秦汉时代，人们已充分地认识到这一点，除各地各具特色的农业生产外，“山西饶材、竹、穀、纁、旄、玉、石；山东多鱼、盐、漆、丝、声色；江南出楠、梓、姜、桂、金、锡、连、丹砂、犀、玳瑁、珠玢、齿革；龙门、碣石北多马、

牛、羊、旃裘、筋角；铜、铁则千里往往山出棋置”。^① 欧洲大陆也可以说是地大物博，但在邦国众多的情况下，任何一国都不可能独享这一环境，都必须依赖国与国之间、地区与地区之间的贸易交流或武力掠夺实现之。而中国却是在一个统一王朝的统有之下，王朝之内尽可以交流共享，如司马迁云：“汉兴，海内为一，开关梁，弛山泽之禁，是以富商大贾周流天下，交易之物莫不通，得其所欲。”^② 此外，各王朝官方所主持的“平准”、“均输”类的各种物流，也与商业交流相得益彰，构建起了“自给自足”的王朝经济结构。乾隆所言，“天朝物产丰盈，无所不有，原不藉外夷货物以通有无”，当良以有焉。

与之相应，就是中国传统社会有较强的人口吸纳力，每当人口压力过重或发生人口峰值危机时，往往就是边地开发与人口迁徙的高峰期，而且，各王朝的人口迁徙除明清时代的部分人群外，基本都局限于王朝境内。另外，中国古代的家产继承方式是严格的诸子平均继承，这与欧洲中世纪的长子继承迥然不同，这一继承方式使得乡村社会可以最大限度地吸纳新增人口。也正因为此，中国传统社会既未出现古代希腊的持续向海外移民的殖民运动，也未出现欧洲中世纪的十字军东侵式的历史。

就思想文化结构而言，中国传统社会与西方世界存在着更大差异，这种差异直接影响了中国的传统外交思想，有利于东方的

^{①②} 《史记·货殖列传》。